

十八梯的角度

□宋尾

一夜雨后，空气凉爽，天阴着，偶尔漏出一抹阳光，很快又被收回。

周一上午的小区，静谧、空旷得像是沉没了。我在阳台吸烟，发呆，忽然想：为什么不去十八梯看看？心念一动，人就坐不住了。

出门，下楼，登公交至轨道嘉州路站，又于牛角沱换乘2号线，就像一个停职许久的人去往单位路上，熟稔得如同本能，但心情却是陌生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2006年到2014年，我一直栖身于某报社，编辑部位于大元广场，紧挨凯旋路电梯，另一侧便是十八梯。

所以，这是我往返9年的路途：上行到较场口，下走至解放西路，殊途同归。理所当然的，我对十八梯并不陌生。但我对它的理解，却是在远离它之后才开始发生的。

从地铁口出来，愕然发现，不知何时天晴了，城市变得明亮起来。我步行至较场口，顺电动扶梯下降，走出甬道，站在梯坎上，背对陡峻崖壁，远眺下端蜿蜒街区，忽然，有点无所适从。我并没走错，但我确实不认识它了。

记忆中十八梯就像一帧残破发白的旧照，是黯淡、黧黑、灰蒙蒙的色调；而眼前场景与脑子里那条老街完全不是一回事。带着一种新鲜，游荡其间，我像一具影子，或上或下，左穿右拐；一种奇怪的穿透性，难以言喻的开明，而这些感受是我之前从未在此获得的——如它塞给我的那种陌生感。

在梯坎井口处，我放眼四周，微微有点眩晕。这是十八梯吗？

我拿手机拍了几张图，顺手发给一位老友，20年前她寄居于南纪门，单位在临江门，十八梯是必经之路。她仿佛洞悉我想说什么，回复道：你可以去爬爬老梯坎，看看那几棵老黄葛树。

沿梯坎一步步拾级而上，来到浓荫蔽日的黄葛老树之下，我忽然明白了，她是在告诉我，这依然还是我们共同熟悉的十八梯：石梯、堡坎、石岩、堰口、崖壁，防空洞口，那些元素都在原处。

事实上，我刚刚便路过了好些黄葛树——这些原来的老树，但我没认出。在许多年前，它们也这样伫立着，但从未完整地展现，或者说我们根本看不见它们的全貌。因为，那些野蛮生长的黄葛树总是受限于逼仄而不得不紧贴墙垣，甚至顽强伸进房舍，而它们的根也狠狠地嵌入到周围地基。我第一次见到完整的它们。如今，它们自由了。

老友又发来一条微信，她说：你知道吗，当见到那些黄葛树，我真的很感动。我庆幸的是它们都在，一棵不少。还有那些石梯，你看看，也都好好的。

我听着她的语音，阁楼上歌手低沉的乐声，游人从高低错落的幽幽小巷里进进出出。

这一瞬，我猛然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怎么说呢，正如那些张扬自由的黄葛树，眼前这个十八梯，就像一个模具被众多外物一层又一层重重包围许多年后，忽然有一天，有人将那些缠绕之物尽数解除——一个真实的轮廓，就此裸露出来了。

虽然，此前十八梯因为一部电影火了，成为旅行者热衷的目的地。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十八梯，而仅是旅行者认为和想要看到的。再说，他们蜂拥而来的十八梯，事实上处于封印状态——所有人都知道必须改动，但还未确定如何改动的一种闭环期——那并不是真实的十八梯。

□熊刚

在万州，有一个叫南门口的地方，那里有我挥之不去的记忆。小时候，无论是下河担水洗衣，还是游泳消暑；无论是回老家乘船，还是去河坝看水涨水落，南门口都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古万州临水筑城，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而兴。古城所在地的南门口，成为万州历史最厚重、经济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南门口河坝是老城的水码头。这里舟车辐辏，人杰浩繁，桅樯林立。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年代，南门口百业兴旺，应有尽有，见证了万州历史上客运货物运输最为繁忙热闹的景象。

一坡石梯在南门口把环城路与长江边连接起来。石梯左右两边，是古朴厚重的石墙。石墙下的两条窄狭巷子，右边是东堡坎，左边是南堡坎。

东堡坎这条巷子相对较长，一直可达东门口，顺梯而下便是东门河口坝，拾级而上便是一马路。南堡坎这条巷子人头攒动，去河坝赶船的，到南门口做生意的人络绎不绝。巷子里有一个竹藤工艺品厂，堆满了藤编和竹器制品。万州夏天炎热，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放着凉床、凉椅、凉板，这些物品大多出自这里。

八梯。

我见过它原来的样子：街上没有一个游客，生存在这儿的人都觉得很拥挤，我们看到的却是生活。但我目睹的也并非完整的它，而只是一个段落：总是污水泥泞的老街，破屋，陋巷，电线纵横。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下半城》，记述了十八梯留给我的真实记忆。

因在小说中提及十八梯，有朋友以为我对这儿有一些特别的情愫。实际上，并不是。确实确实，老街上有人怀念的俗世气息，但并不意味我认同它的全部。

我真正认识它是透过文学、故事和史料。从曾宪国的小说里，我领略下半城花街子的浓浓烟火气；从酒桌上，我听闻作家莫怀威如何坐在十八梯的菜市高声放歌以至被误以为是菜贩的故事；从文史资料里，我窥见它曾经的繁华。

多年前我屡次涌生一个念头：十八梯并不是什么遗世而独立的存在，它与周围的环境相比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从艺术的角度，人们喜欢它，或许是因为它的不规整。但这不可能是常态，也不能持续。

有没有解决之道？肯定有，但无疑是很棘手的。要不十八梯改造也不至于延宕许久了。原本我是不看好的——在我想象中，它很可能就是另一道覆辙，被推平，重建。所幸，事实不是这样。

十八梯改造确实难，难在哪？前几日随几位文友造访中建八局西南公司重庆分公司，参观了一些在建项目，意外得知他们也是十八梯改造项目的施工方，由此也知道了此次改造的众多难点：首先，项目包含41栋单体，其中5栋为历史建筑，且每栋单体各具特色、无重复。这好比做手术，要完整保护建筑形态，就只能从顶部打开，一点点把内脏掏空，然后填充，加固，技术含量很高；其次，整片场地70多米高差，不能动用重机械，只能使用传统工匠方式，肩挑手推，施工难度极大；还有，盖房子不难，难的是修建的同时还要保护，黄葛树、青石板、堡坎、陡坡等元素，七街六巷的传统格局和肌理，街巷的大致脉络、走向都要完整保留下来……

重点是，这个执行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这正是让我感到不安的一点。

不过，事实让我的疑虑消除了。我所见的，也可归结为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消化与理解。我从没想象过十八梯会变成什么样，但应该就是这个样子：遵从历史、符合时代；但又个性鲜明、充满活力。

我得知一些细节，对于老石梯，十八梯最具识别性的重要记忆，为避免损坏，几年时间里，施工团队用塑料板和木板将其全部覆盖。为了原位保住十八梯的几十株老黄葛树，设计和施工单位可谓绞尽脑汁，还专门增加了投资。这，让我欣慰不已。

在较场口转身俯瞰，回望下方错落灰瓦，如今，十八梯不再是格格不入者。这种角度让我蓦然觉得，过往十八梯于我更多是一种内部视角：既不同于浮光掠影的游客，也不同于身处其间的街坊。此刻我俯瞰过去，它才构成了那种完整性。

可是，十八梯从来不仅只是一个具体所指，或者说，并不止于某个固定角度。它更像一个不停循环衍生的故事，或者说一个魔方。总体而言它是一种“范畴”，一种多面晶体，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它也需要生长。事实上它一直都是变化的结果。

南门口与古城墙

过万安桥后，下行一条梯道，就进入西堡坎，我家就在西堡坎上的环城路边上。堡坎里的小巷，古朴沧桑，城墙上偶有的黄葛树，凹凸盘曲，像一条龙，盘踞在堡坎上。这里没有深宅大院的显赫，有的是寻常巷陌的温馨祥和。

南门口一带的环城路很是热闹，不宽的马路两边挤着各类摊点。在这条路上，有我最熟悉的邮电所和诊所，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副食店，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是在这里购买。南门口斜对面是传来机器轰鸣声的蜂窝煤厂。曾经，父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天不亮就去排队，等待着把蜂窝煤挑回家。环城路的电影院，有我们无数的好奇和向往。那时，看一场电影就是一件让人能够高兴好几天的事儿。一家历史悠久的“荣芳”照相馆也在环城路上。1968年春节，父母带着我们穿上新衣服，在这里留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中穿着崭新海军服的我，稚气而憨态可掬。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沧桑厚重的石堡坎，是古万州的城墙，这是万州人凝固的记忆，延续着万州城的历史和文脉。原来，我儿时生长和生活的环城路、南门口和石堡坎是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万州的母城。万州修筑的城墙，不仅担负着防御的军事职能，还担负着防止坍塌、滑坡等功能。万州的城墙也是挡土墙——城外看万州有城墙，城墙有雉堞，而从城内往外看，却看不见城墙，这就是为什么百姓对其不叫城墙而叫堡坎的原因。古往今来，万州没有东城墙、南城墙和西城墙的称谓，人们熟悉的倒是东堡坎、南堡坎和西堡坎。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因扩城建造马路而拆毁东西城墙达320余丈及大部分城堞，并塞填了小西门和小南门，拆下的城墙石被作为桥基石用于建造万安桥。市区向苕溪河以南扩展，万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热闹繁华、功能齐全的城市。到三峡库区清库时，万州城清代城墙残存长度仅有620米了。

2002年10月—2003年2月，存世共1450年的南门口一带古城的清代城墙石被编号拆迁。2014年5月，被置放在红

□吴佳骏

我来的时候，雾已经先来了，它比我更早到达金佛山之巅。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什么赶在我的前面，去与我追赶的东西相遇。无数次，我都想加快步伐，超过那些跑在我前面的人物，结果仍是徒劳。无论我怎么跑，都是个落伍者。就像现在，即使我紧跟着雾的脚印走，也走不成一片云，或云之上的青天。

那么，我索性放慢脚步，在金佛山上兜兜转转，让雾把我包裹住。倘若雾不散去，我就不下山。我愿意跟雾待在一起，不再去看雾之外的一切，包括人间和春天。

与我想法一致的，还有山上的方竹和古树。

我从一条小径穿过的时候，成片的方竹分列左右，形成栅栏。雾就挂在上面，像一匹白布帘子。

我伸手摸摸，只摸到雾的影子和方竹的骨头。更多的方竹，则躺在地上，睡着了，将雾盖在身上，当被子。那些古树呢，就站在方竹林中，头昂得高高的，想把雾顶起来，抛向天空，摔成雨。

可雾实在太大了，树已老得没有力气，它们刚刚将雾抛起，雾又快速落下来，罩在树冠上，给树缠上一张白帕子。于是，方竹和古树都安静了下来，金佛山同样安静了下来。我也安静了下来，我的想法更是安静了下来。

雾越来越浓，让我辨不清方向。

我靠在一棵杜鹃树上歇气。树的皮肤很粗糙，我抓来几把雾，替树磨皮，使它变得光滑

金佛山之雾

些，但树枝上的杜鹃花全在笑我。我顿时羞涩起来，不敢抬头朝上望。

我怕看到杜鹃花的脸色，也怕看到杜鹃花短暂的花期。如此说来，雾真是杜鹃花的知己，它保护了花的生长秘密。当然，天下的花本就不是为天下的人而开的，即便人看见了花，花也依然开在花的世界里，不会跑去人的心里报春。

那些自以为心中有花盛开的人，其实不过是自己原谅了自己，把梦寐假想成了花魂。

风在湿雾中缭绕，吹得我周身发抖。我只好离开树，往雾的深处走。我相信雾既然锁住了我，就一定会给我留地址。不然，它散去之后，就不会有人写信，告诉它山中的日月和季节的私语。可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雾留的地址藏在什么地方。它是将之埋在了树洞里还是草丛中，抑或直接写在了某块崖壁上。

我会想方设法找到它，使雾放心。我要让雾知道，我不只是一个过客，也可以是一个信使。

视线越来越模糊，连眼前的路阶都看不清了。我只能跟着感觉走，在没有人引路的时候，我必须成为自己的灯塔。

我沿着步道小心翼翼地走着，步道延伸到哪里，我并不清楚，在雾中行走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只知道，在我的左边，是悬崖峭壁，长

满了荆棘和藤蔓。由于看不见，我也懒得去猜想悬崖上的风光。既然雾不想让我看见，我又何必去自讨没趣。许多东西，看不见比看得见好。

也不知走了多久，雾似乎比先前淡了些，由乳白变成了银灰。眼前的景物逐渐清晰起来，我看见不少的树都脱光了衣裳，紧密盘错的枝丫裸露着，酷似一幅水墨画，又以书法的线条，生动而和谐。远处的山峰，也依稀露出轮廓，像巨笔勾勒出来的素描。

我很想把金佛山的这批天地之作拓回家去，裱起来，挂在客厅，使枯燥的生活增添几分诗意。

正这么想，不知从哪里蹿出来几只松鼠，在距离我不一米之处蹦蹦跳跳。我数了数，总共有五只，三只大的，两只小的。我的心一下子激动了，刚才所见的画也活了起来。有动有静，相映成趣。松鼠都不怕人，我蹲下身，它们也不逃跑，两只清澈的小眼睛盯着我，好似已认识我多年。

我想，莫不是我在雾中行走的时候，它们也在雾中行走，赶来与我相遇吧。

不多一会儿，雾就散开了，松鼠们瞬间踪影匿迹，我也没有必要再去找雾留下的地址。缘聚缘散，恰如雾聚雾散，顺其自然便好。



“两江潮” 滋润过我的心田

□邢秀玲

“常常，我在多雾多雨的山城温习高原的晴空和云朵，那里的天是湛蓝的，那里的云是随意的：忽而像海浪，忽而像奔马，顷刻又成细碎的鳞甲，柔曼的轻纱……”

以上文字是拙稿《情系高原》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参加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举办的“抒情散文征文”大赛。

当时离开高原不久，对故乡之思念比较强烈，或许正是这份真挚挚意，引起了“两江潮”编辑的注意，稿子不仅很快见报，而且还在那次征文中获奖。能够跻身于10位获奖者行列之中，让我有点惊喜。

自此次获奖开始，我便与“两江潮”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这个在重庆的“异乡人”融进了副刊作者的群体，找到了“家”的感觉。

那时候，正值纸媒的黄金时期，重庆又有办报的光荣传统，各路行业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由于笔者原是《青海日报》的副刊编辑，很快被调进《西南经济日报》，成为“七音笛”副刊主编。于是，我有了更多机会和副刊界的同仁接触，两路口的其香居茶馆、鹅岭的文化茶园、渝中区的人民公园，都是我们聚会之地。一碟瓜子，一盏清茶，就能引出有趣的话题，碰撞出灵感的火花。一个个文学活动的策划，一次次主题笔会的敲定，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了。

重庆直辖前，我们各家报纸每年都要参加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副刊作品评奖活动。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1993年，在《重庆日报》副总编文宗武的带领下，我们组团前往宜宾参加副刊评奖会。会上收获甚丰，会后又到蜀南竹海采风，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莽莽苍苍、漫无际涯的竹海，非常兴奋，当夜提笔写下《竹宴趣》一文。

翌年，我又和重庆副刊界一行七人赴西昌参加评奖活动。在紧张有序的评奖任务完成后，我们参观了卫星发射基地，真是眼界大开，心潮澎湃。回来后，我又写出一篇散文《邛海明月》。

1997年，我们最后一次参加当年4月在成都举办的副刊评奖活动，川渝两地的副刊同仁依依惜别，恋恋不舍。在特意举办的联欢晚会上，多才多艺的副刊编辑们纷纷登台献艺。时任《重庆晚报》副总编的许大立引吭高歌，以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轰动全场，赢得热烈的掌声。《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万龙生朗诵了即兴创作的诗歌《永远的团圆》，由于情绪激动，朗诵达到高潮时，他的一颗假牙竟掉落在地……这个小小的“失误”，一时传为佳话。

重庆直辖后，到四川省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少了，但由《重庆日报》副刊部牵头，仍然组织了很多跨区域的文学活动，每次都搞得有声有色。

2004年秋天，我们前往“川东第一雄山”华蓥山采风。华蓥山曾是游击队员们栖身之地，赫赫有名的“双枪老太婆”曾经在这里指挥作战，留下深深足迹。我们钻进阴湿的山洞，感受当年华蓥山游击队员风餐露宿、艰苦卓绝的生活，胸中顿时涌起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

星移斗转，光阴如梭。《重庆日报》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说，70岁称为“古稀之年”，但对于一家直辖市的党报而言，正是进入日臻完美的成熟期，意味着收获季节的到来，也标志着新时代扬帆远航的开端。而作为《重庆日报》副刊的“两江潮”涛声依旧，浪花如昔。尽管原来的编辑队伍改变很大：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成功转场，但年轻的编辑们依然不忘初心，坚守阵地。

与此同时，作者队伍也呈现出可喜的变化，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才子女子脱颖而出，有情怀，有风骨，有温度的作品越来越多。山乡巨变、生态保护、关注基层的题材已成为“两江潮”的主旋律。

作为年近八旬的笔者，我已经自觉退出阵地。但我仍然要当好“两江潮”的忠实读者，期待每一期副刊靓妆出刊，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传递真善美的力量。



落日归途

车旭 摄/视觉重庆